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现代的先声： 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

姚达兑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现代的先声： 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

姚达兑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的先声：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姚达兑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11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吴承学，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474 - 5

I. ①现… II. ①姚… III. ①基督教—宗教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 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8525 号

出 版 人：王天琪

策划编辑：嵇春霞

责任编辑：徐诗荣

封面设计：曾 斌

版式设计：曾 斌

责任校对：王 睿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25 印张 422 千字

版次印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4YJC751045）成果

◎2016 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项目（立项编号：2016GZZ04）成果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洗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教、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序 言

林 岗

晚清士大夫用“三千年未有之奇变”来形容自己所面对的正在天崩地裂的严峻局面，而这个局面外源性的因素无疑远兆于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千辛万苦成功地在北京这个帝国的心脏站稳了脚跟的事实。只是由于其时力量的天平尚未倾斜而传教士传教又偏好“上层路线”，所以它所酿成的变化仅限于思想文化“西学东渐”的范围，就算后来文化冲突偶尔上升到政治层面也无伤大雅。然而，到了19世纪以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东来为标志的清代晚期，那就众所周知，“事情正在起变化”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引发连串裂变，它们扮演的角色不但戏份加重，有时甚至喧宾夺主，直接上升为历史活动的主角。然而在学术上，对于这么一个在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角色的研究，外语世界似乎要胜过汉语世界。文献资料的获取不易、语言的隔阂和对重要性认识的尚待唤起，都可能是造成这局面的原因。如今摆在我案头由姚达兑博士所撰的《现代的先声：晚清汉语基督教文学》一书，我认为它为汉语基督教文学研究挽回了一局。这部学术著作是汉语基督教文学研究领域迄今最为全面而有深度的学术探讨。姚博士从“耶儒争胜”伴生的基督教语言策略、文化冲突中的推动者和基督教本色化三个不同的路向勾勒了这个实际上超过一个世纪的汉语基督教文学的演变历程，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完整的变迁图像。我读过之后有点感想，附识于下。

当年陈寅恪关注佛教传入中国如何引起外来思想的传播和与本土固有观念的融合，他将外来思想借用本土概念的做法称作“格义”。（见《之愍度学说考》）而正是佛教中人的“格义”推动了佛教与固有观念的融合。东汉以来的佛教东传和近世基督教的传入是我国历史上两个外来文化思想和宗教大规模进入的例子，但是后者尤比前者远为复杂。因为后者不

仅仅是一种外来宗教，而且还在这段历史时期表征了从农耕文化到工业文明的现代性的植入，所以它所引爆的后续的社会变迁链式反应要远超过前者。作为一个接受 16 世纪欧洲社会“宗教改革”洗礼而成熟的基督新教，它的身上不仅具有与“福音书”俱来所标示的宗教思想观念，而且天然地带上了现代社会的“体制的力量”。例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印刷、传媒、医院、学堂还有现代大学，九州域内许多创始于传教士之手。观念尤可缓慢浸润从容斟酌，择善而从，但“体制的力量”则是形势逼人，无从阻挡。于是，在这个社会急速变迁的大时代，既有伴随外来思想与固有观念相互的“格义”，又存在外来体制在本土落地生根与本土调适学习的彼此“效仿”。“效仿”产生于原本不同的体制之间。外来者要进入，则往往关注本地对象，以备“师法”；而新体制在陌生环境萌芽发轫，则往往借鉴近似的蓝本，以供拣择。“师法”在地者和选择近似的蓝本都属于体制生长的“效仿”。凡是“效仿”，当然有因应改变，但是毫无疑问，“效仿”是外来体制在原来陌生的土地上生长的基本途径。汉语基督教文学东渐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可以为姚达兑博士所称的这种“现代的先声”做一个绝妙的注脚。

基督教传播一大特色是讲究布道。布道与佛教一对一参拜神像，或跟随经师喃喃默诵经文，又或举行香薰缭绕的各种仪式不同。布道近似于先知式启蒙的洗礼，强调的是由信众组成的社群之间的交流，因此，语言的选择成为能否征服心灵的攸关所在。传教士要将耶稣的真理“打开中国”，但也存在如何将耶稣的真理通俗化，使之“妇孺皆知”的问题。尽管耶儒的教理是有冲突的，但并不妨碍传教士效仿官员和儒生将儒家的真理普及平民大众的操作方式。从马礼逊开始，传教士皆重视《圣谕广训》及其宣讲，虽然有知己知彼的观念层面的考量，但他们在中国传教发展起来的特殊传道方式未始不是从圣谕宣讲中得到启发。这就是典型的“效仿”——“效仿”自己的对手。“效仿”又在晚清文学变迁中激起了一连串的文化涟漪。传教士用浅近的白话或者直接用所在传教区的方言土话写作或翻译基督教励志故事，这又间接带动了口岸城市的文人用方言写小说。传教士效仿圣谕宣讲，秉持传道务使妇孺皆知的准则，他们的努力结出两个果子：《圣经》和合本的产生与傅兰雅的小说征文活动。前者在传道的轨道之内，而后者溢出了传教的范围。是传教士傅兰雅而不是当时士大夫当中的先知先觉者意识到通俗语言和文学形式可资利用，这个问题的

解答可从传教士比士大夫更善于“效仿”中得到线索。傅兰雅在1895年的小说征文活动，就其对语言和文学形式的选择运用来说，其实是“效仿”了明清以来坊间早已流行不衰的通俗小说传统，只不过他改变其旧的趣味精神而灌注了启蒙意识而已。用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原话说：“窃以为感动人心，变异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如金圣叹、毛宗岗之流的明清文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在古代世界行之久矣，只不过他们不需要“变异风俗”而已。在一个求变求新迫人而来的时代，虚心一点，效仿周边远近的事物，就总能创造出一些新东西来。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明显就是对7年前傅兰雅做过的事情的“效仿”。我用“效仿”一词，并没有贬低历史活动中创造者的创造性。效仿其实就是文化及其体制在变迁中的承接和开启。当我们要被迫回答新事物是怎样产生的时候，关注点就落到了新事物本身，而它显然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创造者从已有的事物那里得到蓝图和摹本，进而按照创造者的理念和需要，加以改头换面，组合拼接出来的，而这就是“效仿”。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效仿”现象也特别频繁地产生，这也说明它作为一种历史活动的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相信，凡读过姚达兑博士这本书者，都能对这段近百年汉语基督教文学的历史频频发生的“效仿”现象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原是姚达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他又花了5年时间打磨润色和修订，补充了大量文献资料，完善了论述，而我作为他攻读学位的导师并没有给予多少有价值的帮助。题目的选定和论述框架的构筑都是由他独立完成的，他也是我教过的省心的学生。他的学术能力特别强，做起老师来我也特别轻松。记得当初谈论文选题的时候，我曾担心过资料难觅，而结果却是他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他入选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研究员计划，跨越重洋，利用资助的方便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广搜珍稀文献，大获丰收。例如，第八章讨论到传教士林乐知译撰的《安仁车》，此前未为学者所知。又如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的参赛作者，过去多不知其生平。姚达兑博士钩沉史料，逐一辨证，竟然大有创获。凡此足以佐证他治学的勤谨、专注和深思。值此草序之便，祝愿他以此为学术的新起点，潜心探学，日积月累，取得更大的佳绩。

是为序。

写于2018年春

目 录

序 曲	1
一、楔子	1
二、对象限定和题目详释	10
三、研究现状和文献回顾	22
四、全书框架和章节要旨	32

上编 典律的碰撞

第一章 《圣谕广训》的流传、英译和影响	39
一、沿波讨源：清初礼乐道统之重建	39
二、一种典律：儒教孝道与“普世真理”	45
三、三种英译：《圣谕》英译与儒耶之争	50
四、小结	62
第二章 圣书与白话（上）	65
一、雅俗与文白	65
二、《圣谕》与白话	71
三、圣书小说：宣讲、俗解和故事	80
四、小结	91
第二章 圣书与白话（下）	95
一、近代基督教新教汉译《圣经》系统	95
二、《圣经》汉译中的语言尝试	103
三、福音调和：《圣经》小说及其语言	119
四、小结	132
第三章 晚清方言小说兴衰刍论	138
一、前言	138

二、兴起	140
三、繁盛	147
四、衰逝	155

中编 文学的推动者

第四章 写作主题：儒耶争胜与打开中国	159
一、前言	159
二、儒耶争胜：马礼逊及其《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	161
三、打开中国：郭实腊及其《中国开门》	174
四、小结	191
第五章 中国助手的文化认同	193
一、“侏离日迫，为祸日深”	193
二、管嗣复与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	196
三、蒋敦复与慕维廉的《大英国志》	203
四、小结：王韬的调适策略	214
第六章 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	218
一、傅兰雅离开中国	218
二、傅兰雅的期待与主体间性	223
三、时新小说与主权想象	230
四、小结：事件的后续影响	236

下编 本色化及其再现

第七章 插图的翻译和基督教的本色化	241
一、前言：跨符号系统的图像翻译	241
二、利玛窦的策略和图像的本色化	243
三、被翻译的插图和宗教的本色化	246
四、借用佛教“西天接引图”模式	255
五、小结	266

第八章 以儒证耶：林乐知译述《安仁车》	271
一、前言：林乐知的消变明教论	271
二、《安仁车》的译者、原作者和源文本	273
三、以儒证耶：证道故事与伦理关系	282
四、小结：林乐知的知识立场	291
第九章 仿制蒙书：基督教《三字经》和太平天国《三字经》	294
一、传统《三字经》的性质及其儒家仿本	294
二、教义争胜和宗教宣传：基督教仿作《三字经》	298
三、太平天国《三字经》的主题和结构	312
四、小结	325
尾 声	328
一、性理之学与东方主义	328
二、圣经东方主义及其化身	334
三、推动者、本色化及其发展阶段	338
四、余论	342
参考文献	345
致 谢 辞	378

序 曲

自西徂东，靡所定处。

——《诗·大雅·桑柔》

取古复今，别立新宗。

——鲁迅《文化偏至论》

一、楔子

（一）典律

1820年1月，自苏格兰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米怜牧师（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其出版的《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一书中，回顾了首位进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初译《圣经》时的状态：“在将《圣经》译成中文的过程中，马礼逊先生有段时间对选用最适宜的文体风格感到茫然无措。正如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中文书籍中也有三种文体风格：文言、白话和折中体。……起初，马礼逊先生倾向于采用折中体；但后来看到一本《圣谕》，使用全然口语的体式，每个月两次在各省的公共场所向百姓宣读，以训诫相关人士并指点他们的政治责任，马礼逊先生决心仿效这本《圣谕》。”^① 马礼逊认为《圣谕》及其语言的优势在于：“第一，因为广大民众更易理解。第二，在人群中宣读的时候，它清晰易懂，而这是经典文言

^① [英] 米怜著：《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4页。英文原书见：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p. 89-90.

体无法达到的。折中体在公众场合宣读时也很清楚，但不如白话体容易理解。第三，在口头讲道时，白话体可以逐字引述而不用加上任何引申解释。”^①

这一部《圣谕》(Sacred Edict)到底是什么书？在当时有多大的影响？马礼逊为何高度赞赏该书，为何会被该书及其语言所吸引，并想效仿该书的语言和风格来翻译《圣经》？须知《圣经》的地位，在基督教传教士的眼中，可是至高无上的。什么作品有资格以及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赶得上《圣经》的地位和影响？还可追问的是，《圣经》的汉语翻译，最适合使用哪一种文体？像《圣谕》这样的作品，使用了“全然口语的体式”(a perfectly colloquial style)，可以在公共场所向公众宣讲，是否满足或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马礼逊等传教士对汉译《圣经》在华被接受情况的种种想象？也进而可追问，《圣谕》和《圣经》及其相关的宣讲方式，在哪些方面（比如修辞模式和作用）相同或不同？

《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一书的作者米怜教士，在该书中记录的应该都是接近于事实本身的情况，而米怜本人也是作为马礼逊“理念的执行者”、代言人而出现。米怜这里所说的《圣谕》，实际上是清初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以及后来雍正帝据之循章敷衍而成的《圣谕广训》（简称为“《广训》”）一书。《圣谕》一书自其产生始便开始流行，其影响一直至清亡仍未停止。甚至到抗日战争时，中日双方都利用它作为动员民众参加各自的“圣战”的“圣书”。^②受《圣谕》及其宣讲的影响，清代出现了一大批解释《圣谕》的文学作品，文类上有俗语诗、证道故事（故事集）和图文相间的散文解说，其后世影响可谓蔚为大观。《圣谕十

① [英] 米怜著：《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② 关于借圣谕宣讲的方式来号召抗日，请参见郭成圩编《怀念与回忆：纪念党的八十生日诗文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成属联中同班的冯明德也是积极分子，外出宣传时他会登上高台披头散发、装神闹鬼、口中念念有词，据说这叫‘讲圣谕’，却讲的是抗日救亡的大道理。”关于日军军方利用圣谕宣讲来号召日本士兵参加“圣战”，请参见陶德民《明清“圣谕”对日本的影响》，见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1943年，东亚同文学院出身的鱼返善雄（1910—1966）编写《康熙圣谕遗训》（大阪屋号书店出版）以配合日本统治者动员日本民众参加‘圣战’。他在序言中写道：‘值此大东亚战争进行三载之际，编者谨将平生崇尚之书奉献于积极投身大东亚圣战之我国同胞，拳拳此心，当获共鸣。’”

六条》及《圣谕广训》在清代的巨大影响（好坏皆有），在清代至民初的书籍历史上少有能出其右者。

《圣谕十六条》（及《圣谕广训》）在清代足称为“典律”（canon）^①，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有趣的是，《圣谕十六条》的第七条中，已非常明确地指出唯有儒教、儒学方是正教、正学，而其他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的教门和学说则属于邪教和邪说，按法照理应在取缔之列。马礼逊想翻译的《圣经》是基督教的典律，他所宗奉的正教当然则是基督教。马礼逊之所以对清廷《圣谕》有浓厚的兴趣，原因肯定不仅在于该书包含了清廷的政治训诫，他作为外来传教士必须了解，也不仅在于《圣谕》的书写语言和风格可资为译经之借鉴。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点：即使此书从内容上看，是与《圣经》相悖反的典律，但是两者在话语类型上颇为相似。马礼逊本想将这一部影响深远的《圣谕广训》译成英文，后因分身乏术，所以嘱咐米怜将其译成英文，1817年在伦敦出版。^② 马礼逊对这一部书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看到了该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知道该书背后隐藏着一套与其宣扬的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价值体系。这种复杂的感情，在米怜的英译《圣谕广训》中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

“典律”（canon）一词，原指宗教经典，在基督教则特别是指《旧约》之首前五卷的律法（torah），即“摩西五经”（包括了《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五经）。^③ “摩西五经”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记忆结晶，在犹太教、基督教中具有无上的崇高性。如“摩西五经”之于以色列民族一样，几乎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典律。典律，从其本质上看，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历史沉淀和文化见证；是被一个或多个族群的无数代读者不断重读和重新解释的一部（或一组）活文本；整体地看，则是一个不断实践的活传统；有时也是宗

① “典律”一词，对应的英语词汇是“canon”，也可译为“经典”“正典”。此处着重的既是经典的“典”，也突出“律”字所包含的规范性和约束力，故而译为“典律”。

② William Milne. *The Sacred Edict*. London: Black, Kingsbury, Parbury, and Allen, 1817.

③ 概括地讲，《创世记》是历史，包括宇宙和万物之生、上古历史（如大洪水）、以色列先民的历史；《出埃及记》的主题是拯救，主要讲述神爱世人、拯救世人；《利未记》的主题则是人如何侍奉神，报答神的恩荣；《民数记》的主题是漂流，即若没有神指引，以色列人只能在旷野流浪；《申命记》则是重申上帝的训诫。总之，“摩西五经”原是以色列人历史和记忆的沉淀物，因而被称为是“神启的真理”，被一等地神圣化，最终成了犹太—基督教的典律。